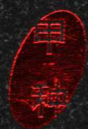


中国

新时期

新文学史研究资料(上)

主编 孔范今 施战军
编选 陈晨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总主编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

中国

新时期

新文学史研究资料(上)

主编 孔范今 施战军
编选 陈晨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甲种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总主编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时期新文学史研究资料. 上 / 孔范今, 施战军主编; 陈晨编选.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4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甲种 /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主编)

ISBN 7 - 5329 - 2423 - 8

I. 中… II. ①孔…②施…③陈… III. 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610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80×980 毫米 1/16
印张/80 插页/6 千字/1254
印 数 1 - 2000
定 价 82.00 元

出版说明

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支撑起了中国文学新的天空，中国文学迅速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并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时期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繁荣，可以说，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追踪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学术界和评论界最具生机活力的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然而，与文学界和研究界的这种“繁荣”局面相比，新时期文学的资料工作则显得有些滞后：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一套权威性的能完整反映新时期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大系，也没有能够全面反映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历程和整体成就的系统资料汇编。这无疑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展示、回顾、总结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反思新时期文学的经验教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

有鉴于此，我们特意邀请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四位在新时期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和评论家来主编这套《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为广大新时期文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权威研究资料，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在资料查找和检索方面的便利，从而为推进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和突破做出贡献。我们力求做到：一，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二，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理论的依据；三，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本套丛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

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每卷除精选各个领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外，还将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索引。本套书采取开放的体例，并将长期出版下去，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重要的学术工程。我们的目标是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并重，力争能使广大读者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又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优秀的研究文章。

目 录

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	樊 骏 (001)
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的建议	马良春 (022)
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	陈思和 (030)
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	吴中杰 (040)
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合理分工和一体化研究	张 中 (047)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	严家炎 (055)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 (070)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陈平原 钱理群 黄子平 (087)
像“史”的史	
——读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刘元树 (139)
当代文学不宜写史	唐 弢 (144)
当代事，不成“史”	施蛰存 (146)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	王 瑶 (148)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樊 骏 (162)
认真求实，共同探索	
——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	
.....	李葆炎 王保生 (192)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	王 瑶 钱理群 (205)
略谈鸦片战争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几个问题	马良春 (217)
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	范伯群 (229)
现代文学研究的困惑与出路(笔谈)	尹 鸿 刘祥安
陈子平 魏韶华 龙泉明 刘 平 谢伟民 赵学勇	(235)

-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 陈平原 黄子平 (263)
- 现代小说“群落”的开拓性研究
- 读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温儒敏 (284)
- 关于重写文学史 唐 弢 (288)
- 评“重写文学史”中的若干观点
-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纪要 ... 刘 遽 (293)
-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总序 孔范今 (296)
- 文学史研究的新收获
- 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龙泉明 (312)
-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评价问题 郭志刚 (315)
- 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反思 赵俊贤 (340)
- 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 陈思和 (351)
- “分离”与“回归”
- 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
- 钱理群 吴晓东 (375)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孔范今 (388)
- 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
- 重评五四文学传统 王晓明 (395)
- 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 汪 晖 (415)
- 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 吴晓东 (421)
- 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 旷新年 (428)

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局面的几点想法

樊 骏

近两年来，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成了大家普遍关心的、怀有很大兴趣和热情进行思考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展开这场思考和讨论的：

首先，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的历史时期。解放思想、进行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对外开放，不仅使中国走向世界，也使世界进入中国；国际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不同程度地促进我们的变革。今天，这种开创和改革已经不只是人们主观上的愿望和追求，而且通过人们的实践正在逐步成为客观的社会现实。尽管一切仅仅是个开端，已经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并且充满信心地预见到光辉的前景；也使我们意识到应该在自己的工作领域、研究实践中，创造出相应的变革。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思考和讨论，正是我们对于这样的变革的响应，也是这样的历史潮流的反映和产物。

其次，这也是我们系统地回顾并总结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几十年来（包括近几年来）走过的道路以后所作出的选择和结论。几十年来，这门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 and 水平，成绩显著。但失误也是严重的，曾经长期地妨碍学科的发展提高，甚至一度把它引向绝境。这几年的工作虽然发生过一些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差，毕竟是个别现象；通过拨乱反正，终于使整个学科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

路，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从这些正反两个方面的成就和不足中，我们不仅深切地认识到必须坚决克服过去的谬误，彻底清除它们的消极影响，而且强烈地感到开创这门学科新局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也获得了开创新局面的勇气和信心，初步找到了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途径和蓝图。事实上，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新局面的工作已经开始，而且取得了最初的成果。如今认真探讨这个课题，并且明确地响亮地提出这样的口号，说明我们并没有满足这几年取得的进展和成就，要求的是更重大的突破、更全面的创新、更深刻的变革。对于每一个熟知这门学科的去而又决心献身于它的未来的人来说，除了开创新局面，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和结论呢？

近几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众多变化和进展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的转化，或者说这个学科开始具有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的成分和特点。这种趋势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谈到我们的工作时大家普遍地强调应该尊重历史，从历史实际出发，要有历史感，进而要求开展宏观研究，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希望加强研究成果的历史的广度和深度等。二是已经有一部分研究论文注意从广泛的联系和历史的纵深中考察这段文学，注意它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和线索。即使是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论者的眼光、视野、思路和方法，也开始摆脱原先那种就事论事、孤立静止的局限，能够兼顾他们在文学历史中的特点、作用、地位、贡献等。这些事例共同地反映了大家已经明确地把现代文学作为一段已经过去了的文学历史（即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看待，开始以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分析评价这段文学。这正是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突破。

不过对于学科建设发展中这样一个深刻的变化和进展，我们还没有也不可能立即充分具备各种必要的条件，完全胜任新的任务，而在具体认识 and 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不少不相适应的想法和做法，有待进一步解决。

比如说，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我们常常会向自己或别人提出这样的询问：这些作家作品这些题目值得研究吗？这样的研究有意义吗？这类作家

作品有没有必要、有没有资格写进文学史？现在提到的作家作品的数量（在有的文学史中达到五百多人）是不是太多了？甚至会遇到这样的意见：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不高，许多作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久就会被淘汰掉、为人们所遗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根本上怀疑研究这些作家的价值。随着这几年研究课题的增加和研究领域的扩大，这样一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历史研究诚然需要对研究对象作出选择和淘汰，很难设想事无巨细，都成为研究的课题，这在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而且一般说来，距离的时间越远，留下来为人们探讨的对象也就越少。问题在于提出上述问题的角度和尺度，都属于选家的、原先那种单纯的文学批评的眼光和标准，即只是着眼于作家作品成就的高低大小，以此作为取舍的唯一依据，而缺少历史家所需要的远为宽广的眼光和标准。以这样的尺寸考虑作品选、作家论、名著欣赏篇目等，可能是相宜的；以此来决定历史研究的内容和课题，就不尽妥当，至少是足够了。历史家是要从历史现象所具有的全部价值和对今天的客观意义来决定要不要研究、人不入史的。其中自然包括个人成就的高低大小，却决不只是这些。历史要研究领袖和英雄的业绩，也要研究人民群众的活动；要研究胜利者的经验，也要研究失败者的教训；要研究一下子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军事上政治上的重大事件，也要研究人们日常从事的生产劳动之类的平凡琐碎的经济现象——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至少是无法说明前者；它们理所当然地都应该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同样的，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史不能只有杰出作家优秀作品的分析评价，还需要包括比这远为丰富复杂的课题和内容。比如那些反映一个时期的文学风尚和发展动向的，那些留下了现代文学运动跋涉的脚印的，那些包含了已经证明是失败和错误的教训的作品、主张、事件和现象。它们都是历史的内容，又都具有历史的启示，难道不都应该成为研究的课题吗？像五四时期发表在《新潮》上的那些作品，绝大部分思想艺术都很幼稚浅陋，不能说是优秀之作，但作为摆脱传统文学的模式，寻找现代文学的新路，正是开拓者们的足迹，是文学史家所不能忽略的。像四十年代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开展的新秧歌运动，也没有留下什么完美成熟的作品，却以其构成现代文学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同样应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新的人民文艺，特别是新歌剧的创作，不正是通过从民间秧歌汲取营养，通过新秧歌运动，得到启示和充实，发展起来的吗？它们都

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内容。迄今为止，我们的大部分研究选题始终集中在为数不超过二十个著名作家的创作（而且局限于他们的若干重要作品）这样狭小的范围里，说明那种选家的、评论家的眼光和标准，是何等严重地限制着我们的眼界，束缚着我们的思路！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在内，历史信息不够丰富、历史面貌不够清晰，缺少立体感、历史感，缺少历史的深广和厚实以及蕴含其中的历史启示，甚至缺少说服力和可信性，往往都和我们只注意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直接有关。当然，既然我们研究的是文学，并不完全排斥选家和评论家的艺术鉴赏的慧眼，而是要求我们同时能更自觉地以历史家的眼光和尺度重新审视和评价这段文学历史，决定研究的选题和范围。将因此会有许多新的发现、新的认识和新的结论！

与此有关的是，我们需要培养自觉的历史态度和严格的科学精神。历史充满了大是大非，充满了激动人心的事迹。研究历史也需要有明确的是非爱憎，需要与人类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所进行的壮烈斗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相称的庄严崇高的激情。对于历史采取冷漠的客观主义的态度，是难以真实地认识和反映历史的面貌的，更不要说作出公正的判断了。但根据一时一地的利害或者个人的偏爱和成见，对待和处理所研究的对象，也是无法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叙述和评价的。我们所以对于已经过去了的事情要作为历史来研究，一方面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沉淀，事件的真相和本质、原因和后果才能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为人们所认识；另一方面也因为有段时间的间隔，人们可以不那么受到一时一地的利害关系的约束，或者个人好恶的影响，能够较为清醒地对待这些事件，两者都有助于研究者客观地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考察和判断这些事件，从而比发生这些事件的当时当地的同时代人的认识全面深入一些、评价准确公正一些。正是在这里，历史研究显示出不同于单纯的文学批评的独特价值。

过去，我们对于这段文学历史（包括许多作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有过多次大的反复，一再犯过“左”的错误，政治运动的影响自然是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但也与我们自身这方面的弱点有关；并不是我们完全不清楚有关的历史事实，而是对于这些事实缺少自觉的历史态度和严格的科学精

神，有意无意地为一时一地的利害和个人感情因素所支配。近几年，我们对于一些作家作品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评价，有时出现新的偏差，主要也并不是对于文学历史缺少足够的认识，而是对于文学历史缺少必要的冷静。过去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曾经严重地伤害过、不公正地批判过或者冷落过一些作家（其中有的已经含冤去世了），今天理应为他们平反昭雪，他们的不幸和冤屈也确实令人同情，为之不平。但要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主要还是得靠理智；过多的感情因素正是这几年里有的作家评价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原因之一。同样的，各人的艺术爱好不同，文学作品不同的艺术风格常常会在人们中间激起截然不同的反应，作出完全迥异的判断。个人的好恶或许可以不失为选家和批评家的一个尺度，却不应该成为历史家立论的依据，至少这要服从于历史发展的整体客观事实，统一于历史的理性。在一些情况复杂、优点和缺点、功和过都相当明显又交错在一起的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面前，更需要警惕这样的偏颇，树立自觉的历史态度和严格的科学精神。

马克思提到的一个实例是很能说明其中的道理的。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以后不久，对于这个历史性事件出版了不少专门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说：“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这里提到的三位作者，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的分析评价，正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很显然，只有马克思的态度和精神，才是我们的典范。

又比如历史是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有机的整体，是个前后发展的过

程。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充分揭示这个整体的演变过程，分析评价这个整体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兴衰浮沉的经过，即所谓历史的流变及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和地位，还有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等。这也和单纯的文学批评的任务有所不同，会遇到多方面的新的要求。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新的研究课题：要求我们去思考和探索过去没有涉及过的方面，即除了单个的作家作品、个别的文学现象文学事件以外的、关系这段文学历史发展演变的许多题目。只有这样，才能概括出这个文学整体的基本面貌，勾勒出这段历史进程的基本脉络，也需要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作出相应的变化。即使是对于单个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事件的研究，也要克服将研究对象从历史的整体和过程中游离，进行孤立静止考察和评价的做法。在艺术分析中，也要求给主要来自传统的诗话、评点的那种常有直观性、经验性的鉴赏式的批评方法，注入更多的历史的具体性和思辨的理论内容，形成更为完整的审美思维形态。既然我们研究的对象都是历史整体和过程中的组成部分，那就要求我们自觉地从这样的全局出发，进行我们的工作。即使所研究的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局部、片断甚至插曲，也要求我们的结论不要停留在个别文学现象和活动的分析评价上（比如只叙述作家的生平和思想创作的经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然后分别作出高低优劣的判断），而希望它可能进一步指出他们的历史意义、地位和贡献，找出蕴含其中的反映历史演变的轨迹、线索和规律，引出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至今仍然对我们有用的历史的启示。长期以来经常为人们所提到的却又始终言之不详的一些命题，如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女神》开了一代诗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人民文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等，只有经过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这正是单纯的文学批评难以完成，要由综合的历史研究承担的任务。

所以，在进入历史研究的新阶段以后，在对于这段文学的认识和态度上，在研究的看法和任务上，都需要作出许多相应的变化和改进，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的历史研究，也才能真正开创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二

我们有一支四千人左右的队伍，每年写出近千篇文章，专门著作也在一年一年地多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我们的不足和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虽然有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这几年来在增加选题、扩大领域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雷同、狭窄、单一、呆板等，仍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对于现代文学，无论从广度或深度来看，都还没有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还不足以充分揭示这份文学财富的内容。换句话说，与研究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相比，我们考察的角度和方法过于单调，论证的模式和格局过于僵硬，得出来的成果也过于单薄。而随着研究人力的成果的增多，近年来有些同志担忧自己的工作会和别人“撞车”，更有些同志为想不出新的题目感到苦恼。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上述束缚的严重性。从原来的那些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在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模式和格局等方面进行开拓和突破，已经成为建设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紧迫课题，开创这门学科新局面的重要途径。事实上这几年已经有些同志在这些方面作了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初步成绩，现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的同志更自觉地进行这样的开拓和突破。

几十年来，我们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或主要是对于作品的主題、題材的分析评价，即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內容、写什么的探討上，或者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剖析。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从它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它的社会功能立论，是完全必要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尽管有些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讽刺说这不是文学研究，我们中间有些同志也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犯了庸俗社会学的错误。我们不要动摇，不能也不应该放松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为什么在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在广泛向世界求索真理、汲取营养、寻找借鉴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多种思潮流派相继介绍到中国，并且都有了传播和实践，但后来真正在中国文坛上生根开花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并且形成了我们自己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为什么从鲁迅、郭沫若、茅盾，一直到丁玲、何其芳的众多作家，都经历了一条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的道路，他们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对于文学史上这些重大复杂的问题，难道能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即从这些现象本身，而离开现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革命运动找到全面科学的解释吗？难道因为联系现代中国的社会存在来说明文学史上的这些变迁，就不再是文学研究了吗？

所谓社会学的分析，在我们的工作中，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有许多课题需要探讨。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很多同志“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因此在工作中“弄出许多错误”。我们在研究这两个地区的文学历史时，仍然未能充分估计到两种不同的客观环境的深刻区别。如果说在当年的文学工作中往往无视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差异，而发生许多与根据地格格不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矛盾，那么后来研究这段文学历史时，更多的是忽略国民党统治区与根据地的区别，对其中的文学工作提出一些不切实际、非历史主义的要求。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些大城市中的租界和香港这种地区的存在对于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除了“孤岛文学”这一段以外，几乎还没有作过认真的专门的研究。而它们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历史的分析。又比如对于老舍描绘的北京市民新旧时代的生活，李劫人、沙汀等人笔下四川城乡各阶层的风貌，赵树理再现的太行山农村翻身解放的斗争，艾芜、沈从文点染的发生在西南边疆、湘西山川间的悲和喜，大家都很赞赏，但对其中的社会、历史以至于民俗的、民族的内容，大多仍然是未被人们识别的宝藏。近几年来关于吴荪甫和莎菲等人物形象的争论，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于《子夜》、《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评价上的分歧，关键也都在于如何理解这些艺术形象的社会内容，首先需要的仍然是更为准确深入的社会学的考察评价。所以从发展提高这门学科的学术水平来看，在社会的历史的分析方面，选题和领域、角度和方法都期待着我们作出新的开拓和突破。

当然，文学是艺术作品，具有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征。它的社会功能除了认识生活、思想道德教育以外，还有美学上的价值；而且无论是对于生活的反映，还是发挥思想教育精神陶冶的作用，也都得通过作家的艺术创造、作品的艺术形象和读者的审美感受来实现。所以只研究作家写什么而不同时研究怎么写，只注意作品的主题、题材而不进入作家的艺术构思的过程、艺术形象形成的过程、读者接受作品的过程，就不可能准确

地说明作品，包括它的认识生活、思想教育等功能，也无法解释同样主题、题材的作品为什么有受到热烈欢迎的、久久不能忘怀的，也有令人生厌、无人理睬、很快就被遗忘的？从而也就难以充分评价它们的成就和意义。我们过去的不足和缺点，就往往在于不够重视文学的这种艺术特性。不是忽略了它的美学价值，就是离开了这种特性讨论文学的主题题材，特别是缺少那种不是从固定的概念和定义出发的，而是从作家各自认识、掌握和表现生活的特殊的艺术方式出发的、细致深入的艺术探索。这种欠缺，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中，表现为他们的创作特点、艺术风格和艺术上的成就，很少为人们所论及。比如鲁、郭、茅、巴、老、曹和赵树理这样一些大师，他们的文学语言都各具特色，即使只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摘录一些段落，人们也会很快识别出来；田汉、曹禺、夏衍这几位最杰出的剧作家的戏剧艺术从情节结构到台词都有多么鲜明的特征，决不会被人们混淆；张天翼、沙汀、蒋牧良都有讽刺作品，但他们那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生花之笔又是何等不同。对于这些，我们不正是赞叹多于剖析吗？在更广泛的领域里，空白和缺口也就更多了。比如对“五四”以来各种文学体裁的演变、各种表现手法和文学风尚的兴衰等，都很少有人研究。所以，前面提到这门学科正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转化，决不意味着对于现代文学作品的艺术评论已经很多了，不再需要了。说得严重一些，关于现代作家创作实践方面的成就和缺陷、经验和教训、创作规律等，基本上还是一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近几年虽然出版了一些按特定的文学体裁编写的分门别类的文学史著作，却很少对有关的体裁的格局、形式、手法的形成、发展、演化作出系统的考察和说明，成为它们最大的弱点。因此，今后的综合的历史研究不仅不排斥、而且必须重视艺术的分析 and 评价。正是在这些方面，特别使人感到我们对于现代文学丰富复杂的内容的认识、分析和评价，都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作更多的开拓和突破。

需要改进的，还有长期形成的过于严格繁琐的学科分工的局面。我们研究的是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三十年间的文学历史，时期短，范围小，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是个很小的学科。这样的区分和设立学科，是严格分工的产物。如果说在一定条件下，这样的分工符合科学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具体细致地掌握所研究的对象和周密准确地分析解决问题；那么在另外的场合，摆脱这种分工所造成的限制，同样出于发展科学

的需要，同样会促进研究工作的提高发展。如今，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就现代文学论现代文学的局限性，发现这已经不足以进一步说明这段文学了；而迫切地需要从更辽阔的背景和更广泛的联系中，从更多的角度和侧面来考察和说明这段文学历史。比如说为了阐明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历史性转折的意义和贡献、它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和特点，就需要联系着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当代文学来研究；为了剖析中国现代文学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它与外国文学的异同、它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又需要联系着外国文学来研究。即使只就鲁迅一个作家而言，他是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只从文学的角度分析评价他，是无法充分说明他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性贡献的。前几年提出的创立鲁迅学的建议，正是为了把鲁迅研究从现代文学研究的圈子中扩展到更为宽广的科学园地中去。有位正在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同志谈到他在读了几本社会学家编写的现代中国的农村调查报告和专著以后，对于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农村题材作品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个例子启发我们如果结合着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和其他门类的艺术，同时从那些方面和角度分析评价现代文学，肯定会有许多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发现，从而比较充分地发掘出它的丰富多彩的内容，比较全面地认识它的价值。当前，人们不是在谈论科学的一体化的趋势和综合性的知识结构的需要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了今天，也的确要求加强和开展宏观的、综合的、多种学科交叉的、多学科之间的边缘性的研究。随着知识的更新的知识结构的变化，也一定会使我们对于同一个对象做新的考察，有新的发现。这样的开拓，将为我们提供多少新的课题，打开多么广阔的新天地。

在讨论如何改变现有的研究模式和格局时，方法论的问题受到不少同志的重视，有些青年同志已经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尝试着新的方法，主要是吸收借鉴国外流行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理论思想体系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方法一般说来是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当方法论上的革新有助于认识和利用所研究的对象时，这就成为发展科学的有力杠杆，不但可以丰富充实原来的理论思想体系，甚至由此导致新的学说、新的学科的诞生。所以，近年来一些同志的这种努力，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开创新局面的需要，确实是这门学科进行开拓、实现突破的又一个重要途径。但